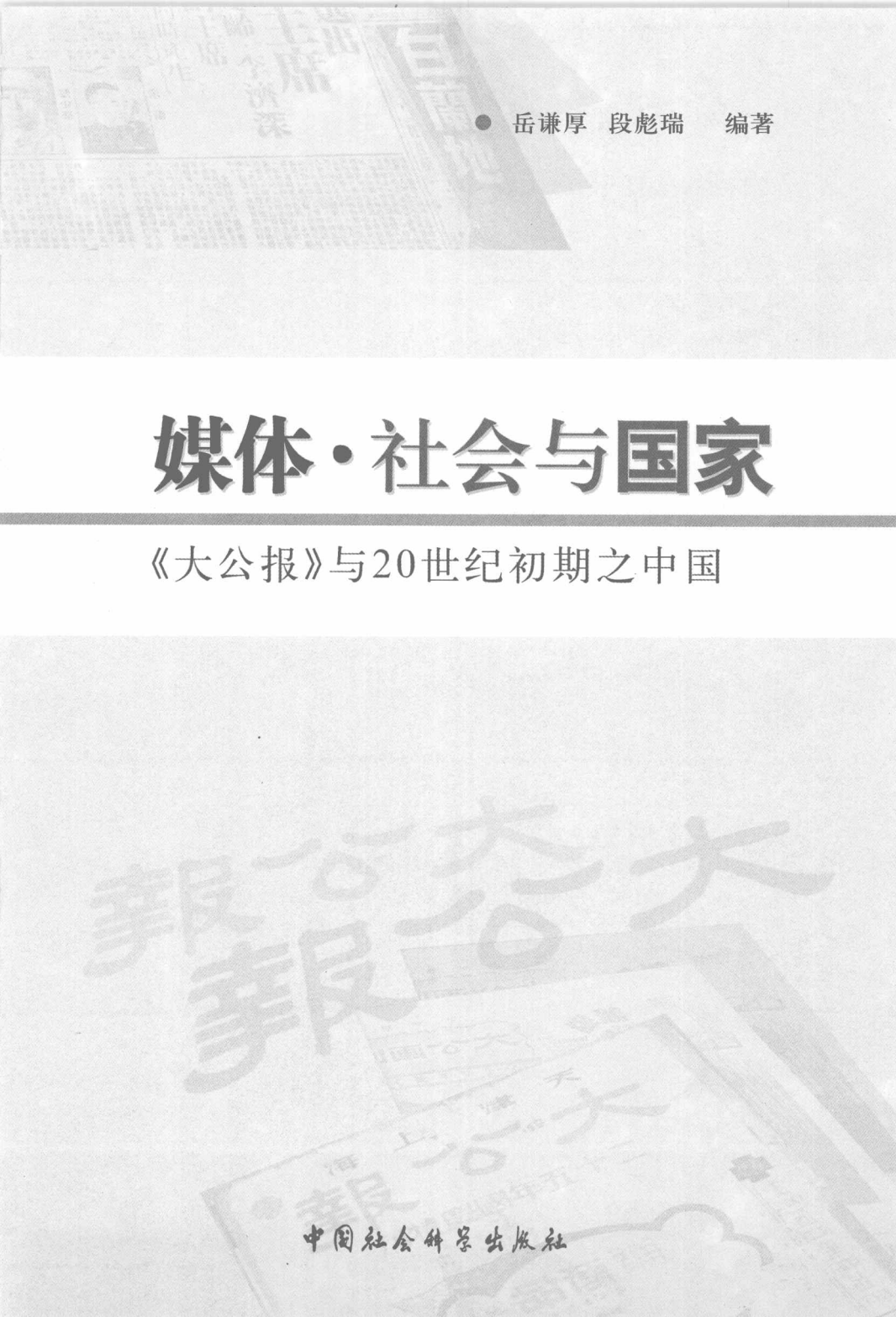


● 岳谦厚 段彪瑞 编著

# 媒体·社会与国家

《大公报》与20世纪初期之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岳谦厚 段彪瑞 编著

# 媒体·社会与国家

《大公报》与20世纪初期之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媒体·社会与国家:《大公报》与 20 世纪初期之中国/岳谦厚、  
段彪瑞编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5004-6898-1

I. 媒… II. ①岳…②段… III. ①大公报—研究②中国—近代  
史—研究—民国 IV. G219.296 K25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6482 号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弓禾碧工作室  
技术编辑 张汉林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875

插 页 2

字 数 229 千字

定 价 23.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清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在天津创办，曾先后或同时在上海、长沙、重庆、桂林、香港、北京等地出版，至今仍在香港刊行，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营报纸之一，亦是中国唯一一份具有百年历史的中文报纸。在其存续及发展过程中，详细记录了近代中国所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或众多有趣的历史现象，见证了百年中国所经历过的各种社会变化。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大公报》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其存在本身，包括其与社会的互动，都显示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大公报》作为报纸媒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出现和生生不息，这种历史现象本身，即蕴含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大公报》本身就是一个亟待深入开掘的‘宝藏’，吸引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sup>①</sup>换言之，将《大公报》视为一种重要的历史资源并以之作为一种基本的分析依据来考察近代中国社会是可取的，且为先前的许多研究所证明。

报纸是中国近代才有的一种重要资源，亦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的一种独享的待遇。基于此，我早在南开大学求学之际就开

---

<sup>①</sup> 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始关注诸如《大公报》之类的舆论传媒并重视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后来在指导研究生过程中更极力动员那些感兴趣的学生紧紧围绕“媒体·社会与国家”这一主体思路进行专门而系统的研究。经过多年努力，现在终于有机会将一些主要的研究成果结集成书！

本书是在“媒体·社会与国家”这一思想架构下，由我和山西大同大学段彪瑞副教授、山西师范大学张玮副教授以及我所指导的研究生或本科生完成，而最后修改与定稿则由我和段彪瑞两人负责。同时，为彰显我和段彪瑞同志之外的其他研究者的个人贡献，兹将他们参与研究的具体内容录制如次：1902年天津霍乱防治及其社会影响（刘红彦）、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农村合作运动之讨论（许永峰）、1931年鄂豫皖三省大水（董媛）、阎锡山“土地村公有”理论及其实践办法（许永峰）、“客军入晋”与晋南社会（张玮和董媛）、20世纪30年代初期陕南“交农”现象——《大公报》记者“陕南视察记”之分析（张玮和董媛）、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之裁兵运动（王瑞霞）、和乎？战乎？守乎？——“九一八”事变后关于中国抗战问题之讨论（张玮和范瑞）、1937年上海“纱交风潮”（张玮和武婵）。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系以《大公报》报道、社评及其所刊文章为基本素材的一些专题性研究，且以20世纪30年代前后发生的某些重要历史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或范畴，而非20世纪初期《大公报》与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研究。

岳谦厚

2007年8月于太原

## 目 录

|                              |       |
|------------------------------|-------|
| 前言 .....                     | (1)   |
| 1902 年天津霍乱防治及其社会影响 .....     | (1)   |
| 20 世纪 30 年代关于中国农村合作运动之讨论 ... | (54)  |
| 1931 年鄂豫皖三省大水 .....          | (136) |
| 阎锡山“土地村公有”理论及其实践办法 .....     | (177) |
| “客军入晋”与晋南社会 .....            | (197) |
|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陕南“交农”现象        |       |
| ——《大公报》记者“陕南视察记”之分析 .....    | (208) |
|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之裁兵运动 .....          | (222) |
| 和乎？战乎？守乎？                    |       |
| ——“九一八”事变后关于中国抗战问题           |       |
| 之讨论 .....                    | (249) |
| 1937 年上海“纱交风潮” .....         | (265) |

# 1902 年天津霍乱防治 及其社会影响

清光绪二十八年即公历 1902 年（下文以公历纪年）夏，天津地区爆发大规模流行霍乱，而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英敛之创办于该地的民营报纸《大公报》在其创刊发行当日，即 1902 年 6 月 17 日就以“时事要闻”形式发布了此次疫病发生发展的某些基本情形。随后，该报除以“时事要闻”外，又以“中外近事”、“译件”、“来函”、“广告”、“论说”、“都署批示”等形式或专栏，继续对整个疫情发展与防治情况、医界关于霍乱病症的医理分析与救治等内容进行追踪性宣传报道，可谓不遗余力。很显然，以之作为主要历史资源来系统地考察该次疫情的整个防疫机理、医理探讨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变化，或中国防疫机制由传统向近代演变的一些主要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并彰显天津霍乱防疫在中国防疫体制变迁中的地位及对其城市近代化的影响，是非常有意义的。

## 一 疫情防控

1902 年，天津时处西方列强联军殖民统治之下，霍乱一度呈爆发性流行态势，对当地社会经济与民众生活产生了较大影

响。天津殖民政府（都统衙门）与民间社会进行了广泛的防疫动员，并积极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使疫情在较短时间内得以有效遏制。这些措施在制度层面较多地呈现出西方防疫色彩，初步具备了近代防疫机制的诸多特征，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传统防疫制度的近代转型。

### 1. 霍乱起源及对当地社会之影响

1902年，亚洲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爆发性流行霍乱。据载，印度仅“西历（1902年）三月二十二号以前一礼拜内，……患疫而死者共二万六千一百零八人”<sup>①</sup>。日本自1896年至1901年“每年染疫身亡者至少高达万人”，1902年东京疫情仍十分严峻，“刻下东京虎列拉疫症（霍乱别称）患者渐多，大有蔓延不可收拾之势”。韩国“今年死于疫者已有一万五千人之多”<sup>②</sup>。南亚吕宋“岛中时疫盛行，人皆惴惴，西历上月（三月）十六日二十四点钟内患疫者多至一千二百一十七名，因而不治者八百四十七名”<sup>③</sup>。据张剑光的研究，本年中国部分地区霍乱盛行似与外传霍乱有关<sup>④</sup>。不过，此次霍乱疫情在天津等地出现且流行更与当年气候异常关系密切。是年由春入夏，直隶、京师一带气候异常，直隶境内数月亢旱，“自津至保府（保定）沿河一带，上下数百里也，两三月以来雨水极行稀少”，田禾已枯，河水断流<sup>⑤</sup>。温差在短期内也呈异常变化。以京师为例，六月初二、初三两日酷热干燥，温度高达35.6℃，实为历史未有之记录。“十二日为

① 《疫症骇闻》，《申报》1902年6月8日。

② 《译件》，《大公报》1902年7月3日。

③ 《时疫骇闻》，《申报》1902年5月30日。

④ 张剑光：《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教出版社1998年版，第547页。

⑤ 《时事要闻》，《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

初伏，第一日而都门天气骤凉，温度降至七十度（华氏度——编者注）以内，午后微雨，仅能湿尘，而凉风侵肌，令人难耐。”<sup>①</sup>然“津郡入夏以来，天久不雨，暑热燥烈之气由上而下，浊秽之气自下而上，人处其中，或遭秽浊熏蒸，加以天时之忽冷忽热、食品之半生半冷，寒暑杂糅于中，正不能堪，故三焦溷浊、清浊相干，遂成霍乱”<sup>②</sup>。持续数月的干旱及起伏不定的气温变化，为霍乱滋生与流行提供了适宜的气候条件。再者，津郡地处北方交通中枢，久为通商大埠，交通便利，人烟稠密，而“霍乱在人烟稠密之城镇，湫隘潮热之庐舍，传染最易”<sup>③</sup>。时值八国联军占领之际，中外人口流动频繁，加上天津公共卫生条件较差，流丐充斥，生存环境恶劣，霍乱极易在此引发且迅速蔓延。5月，天津等地出现霍乱疫情，并渐呈爆发性流行态势。此次霍乱始见于塘沽，继见于天津，随后由此分路传染，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呈扇形扩散，传至京师等地，并于6月进入高发期，直隶“城厢内外，日死数十，疫气至今未消”<sup>④</sup>。自霍乱发生至6月27日，天津染疫身死者620人<sup>⑤</sup>。“京师疫死之流丐，道毙之车夫，九城内外，日不知凡几。”<sup>⑥</sup>更为严重的是，霍乱逐渐由城市向卫生及医疗条件更差的农村扩散。据《大公报》报道：“时疫流行，传染甚广。顷有人由西河东来，据称王家口胜芳各乡镇日间死亡相继，医药无灵。其得病之暴，较津地尤甚。”<sup>⑦</sup>

① 《中外近事》，《大公报》1902年7月13日；《中外近事》，《大公报》1902年7月19日。

② 《广告》，《大公报》1902年6月24日。

③ 《论说：霍乱症预防法》，《大公报》1902年7月12日。

④ 《中外近事》，《大公报》1902年7月9日。

⑤ 《译件》，《大公报》1902年7月3日。

⑥ 《中外近事》，《大公报》1902年7月11日。

⑦ 《中外近事》，《大公报》1902年6月23日。

霍乱俗名黑螺痧，又名子午痧、瘪螺痧、吊脚痧，系由霍乱弧菌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以“吐泻、抽筋、脉绝、身凉、音哑、目吊”为典型病征，传播速度极快，死亡率甚高。一旦发病，危险立见，“针药盲效，越时身毙”<sup>①</sup>。该疫病迅速蔓延对津郡地区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造成了一定数量的人员死亡，特别是精壮劳力。霍乱症状表现为急性胃肠道疾病，一旦染病，病程短，死亡率高，往往数小时即可夺人性命。据《大公报》报道：“浙江知县王某系广东人，……由京乘火车来津，甫下车，忽患时症，当即抬赴过街阁医院，医治无效，旋即病故。”<sup>②</sup>“粮店街同茂永某伙友于初九日午刻陡患时疫，当由三段绅董转报三皇庙医院，照章送院就诊，……诂到院，未及施治，即已毙命。”<sup>③</sup>“……选人某赴部验看，货车至前门，猝感时疫，车夫不敢载，欲而下之，欲以重价，亦不应，无奈以五金雇人力车回，未及寓所而卒。”<sup>④</sup>诸如此类的案例比比皆是，足见霍乱伤人性命之快，危害之烈。据不完全统计，“自霍乱爆发至二十七号夜（6月27日）津郡共染疫七百五十人，获愈七十人，仍在医院调治者四十人”<sup>⑤</sup>。若不计仍在医院调治者40人，共死亡640人，死亡率至少达87%以上。之后两月，虽无具体数字见诸报端，但报载案例较前并无大减。若不依其后官方医院染疫病亡统计数字，仅据民间防疫医院账日公布，自6月24日至8月6日即已济贫施棺628副。又因民间大多讳疾忌医，隐瞒不报、私自掩埋现象屡有发生，真正死亡数字绝非少数。尤值得注意的是，

① 《来函》，《大公报》1902年8月28日。

② 《中外近事》，《大公报》1902年7月17日。

③ 《中外近事》《大公报》1902年7月15日。

④ 《中外近事》，《大公报》1902年7月7日。

⑤ 《译件》，《大公报》1902年7月3日。

精壮劳力在染疫死亡人数中占有较大比例，且染疫呈现出明显的性别与年龄差异，“男子患者必多于妇女，中年患者必多于幼稚、老人”<sup>①</sup>。同时，霍乱与其他传染病一样，又呈家庭聚集特点。据载，“有河西大房村农人王姓者，大小眷口十人，连日染疫，身毙六人，仅剩一老嫗，年近古稀，二孀妇年逾四十一，童孙仅七龄，田业七十亩，雇二长工耕耨，藉以糊口”<sup>②</sup>。又，“正蓝旗防御民妇富察氏，其姑死于疫，其夫又死，其子又死焉，妇质衣鬻饰，倾资以为殓……”<sup>③</sup>精壮劳力丧失不仅造成巨大的家庭精神痛苦，亦使家人处于“老无所养、幼无所扶”的凄惨境地。

第二，影响了津郡地区社会生产与民众生活，食品饮料行业尤遭重创，瓜果及其他生冷食品遭禁，汽水公司则一律歇业。市场物价出现异常波动，“百货昂贵，……民人有商癆民病之谣，若以稻米而论，乱前每包仅五六元，刻下银价大增，每包反加至十二三元有奇，商民交困，莫为此焉”<sup>④</sup>。物价上扬、商业凋敝虽由诸多因素引发，却与霍乱盛行不无关系。

第三，此次霍乱来势凶猛，波及范围宽广。“往年患疫恒贫苦，食力者流居多，而此次则高门大宅、深居简出者亦或不免。”<sup>⑤</sup>霍乱既殃及华人又波及洋人，既在民间大张肆虐又入华洋军营，除大量平民外，官府胥吏、大内皇族亦遭不免。据载，保定知府陈本因疫病故<sup>⑥</sup>，传闻直隶总督袁世凯亦染时疫，西班牙领事死于霍乱<sup>⑦</sup>。总之，此次霍乱传播速度快，死亡率高，涉

① 《论说：霍乱症预防法》，《大公报》1902年7月12日。

② 《中外近事》，《大公报》1902年7月24日。

③ 《中外近事》，《大公报》1902年7月6日。

④ 《中外近事》，《大公报》1902年6月30日。

⑤ 《中外近事》，《大公报》1902年7月17日。

⑥ 《译件》，《大公报》1902年7月27日。

⑦ 《译件》，《大公报》1902年6月19日，7月25日。

疫范围广，几成燎原之势。这种爆发性流行态势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天津殖民政府及民间力量相继介入并出台了各种防疫措施，以快速将之扑灭。

## 2. 防疫社会动员与防疫医院之建立

爆发性霍乱流行的严峻态势迫使殖民政府和社会各方对之迅速作出回应，即为遏制疫情进行有效而及时的社会动员已为情势所需。社会防疫动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参与，并能为之提供一套有效的防疫政策和必要的防疫设施，以对整个防疫行为进行规范和管理，进而阻遏疫情的蔓延与扩散。囿于资料，我们对于津郡防疫动员过程中的政策制定、机构建制、人员配备及防疫设施建设难以作出全面梳理，但仍可借助于其间成立的民间防疫医院即保卫医院从一个侧面考察天津殖民政府和民间社会所作的努力。

保卫医院系天津殖民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防疫动员的产物，其筹建为津郡绅商首倡。据《大公报》6月18日报道：“津郡时疫流行，传染甚速，东西各界设法预防，实已造福地方不浅，乃津人疑神疑鬼，谣言繁多，愚夫之愚，亦何可笑。兹闻某君深悯华人愚陋，且与卫生之学素未讲求，于日前纠合本郡各洋行商人聚议筹款，创办施医院，……以惠津人。”<sup>①</sup> 21日报道又称：“本埠盐商素称巨富，此必能量力筹捐，赞襄善举，毋另他人专美于前也。”<sup>②</sup> 不过，当日就有消息说部分防疫医院已获建立，此消息在6月26日保卫医院“施医施药”通告中证实。该通告指出：“暂行保卫医院稟蒙都宪及卫生局医

① 《中外近事》，《大公报》1902年6月18日。

② 《中外近事》，《大公报》1902年6月21日。

官批准，在城厢内外设立十一处，以便各段居民就近入局医治。今定于本月十九日先设文昌宫、贫民院、府署、五彩号胡同、捐局、河北张公祠五处先行开诊，除河东二处由卫生局批准归该段绅董自行设立，本局允为协济，尚有四处亦赶紧择地设立。”<sup>①</sup> 绅商善款捐赠或暂垫乃是民间保卫医院迅速建立的关键因素，这一善举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广泛赞誉，内称“贫寒之士民之赴院求诊者纷纷不绝，创办诸君之盛德，洵堪不朽也”<sup>②</sup>。

然而，保卫医院作为面向基层民众提供免费医疗的防疫医院，耗资甚巨，仅靠个别绅商捐赠显难长久维系。因此，在其建立之时及之后，社会各界特别是商界曾发起善款捐赠活动，以提供资金支持。同时，殖民政府也下拨资金，予以资助。具体筹款情形详见下表：

表 1 保卫医院筹款统计表 (单位：银/两，洋/元，铜钱/千文)

|    | 社会捐赠     |        |          |       |       | 政府拨款  | 利息收入    | 合计       |
|----|----------|--------|----------|-------|-------|-------|---------|----------|
|    | 个人       | 商户     | 行、帮      | 个募    | 商募    |       |         |          |
| 白银 | 1105     | 2196.5 | 32061.18 | 139.3 | 47.79 | 10000 | 32.12   | 45582.61 |
| 银洋 |          | 800    | 4957.7   | 97    | 115   |       | 9.136   | 6518.836 |
| 铜钱 |          |        | 70       |       |       |       | 657.956 | 727.956  |
| 折银 | 40907.27 |        |          |       |       | 10000 | 275.5   | 51182.77 |

资料来源：《保卫医院广告》，《大公报》1902 年 9 月 4—5 日。

从表 1 看出，社会捐赠、政府拨款及募集款项的生息收入是

① 《广告》，《大公报》1902 年 6 月 26 日。

② 《中外近事》，《大公报》1902 年 6 月 24 日。

保卫医院经费的三个来源。若不计募集款项的生息收入，在社会捐赠与政府拨款的 50907.27 两白银中，社会捐赠部分占 80.36%，政府拨款占 19.64%，即保卫医院经费主要取资于社会，显示出其以民间社会为主体的特征，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又与政府相结合的性质。在社会捐赠部分，从筹款方式来看，除行、帮以行业组织为单位捐赠外，还存在个人与个别商户直接捐款以及个人与个别商户代募等多种形式，而这种灵活多样的筹款形式表明津郡防疫筹款动员的广泛性；从捐款数额来看，若按当时银、洋、钱三者比价兑换白银，行、帮捐赠白银 36121.78 两，占社会捐赠部分 88.3%，个人与商户直接捐赠与代募占 11.3%，即以行、帮为单位的捐赠占了绝大比重，行、帮成为津郡防疫筹款的主体，此又表明天津作为口岸城市具有较强的社会资源能动性。若从行、帮内部捐款情况进行分析，更发现此次捐款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参与捐款的行、帮计有 32 个，几乎涉及津郡社会各个工商部门，捐款数额位于前三位的是众洋商行银 14793.66 两、洋 48.5 元，众钱行银 9477.39 两，众广帮银 1140 两、洋 340 元，如折算白银三者计 25729.25 两，占社会总捐款的 62.89%；后三位是钢铁店、众帽行及众鞋行，分别折银 32.76 两、19.43 两和 17.85 两。具体到某一行、帮内部各商家之间，捐款数额亦参差不等，有的高达 1000 两，有的仅洋 3 角。各行、帮、商家捐款数额悬殊实与其资本是否雄厚有关，但其反过来却表现出津郡社会为筹建防疫医院进行社会动员的广度和深度。除资金外，社会各界在其他方面同样为保卫医院的建立与运作提供了诸多帮助，正如保卫医院广告所言：“本郡善绅王树泉翁素性好施，乐善不倦，今藉各绅商稟请都统衙门批准设立医院十一处，有助资财，有施棺木，有助人力，各尽其心，唯有义地缺，如缘此愿，愿将自置空地一段约计二十亩有奇按原置价

取回一半，其余一半慨助暂行保卫医院作为义地，埋葬无主棺廊。此举功德莫大，理应登报申谢。”<sup>①</sup>另据7月6日保卫医院广告所载，某君施棺100副，二善士施毡700条，等等<sup>②</sup>。

保卫医院建立更与殖民政府政策支持不可分，其筹建之始，“西楼德国分卡武弁尔宾斯与袜庄分卡德弁顺易安二君各将所属段内绅董延至公廨，商酌设立医院，各绅董均愿举行，以惠地方”<sup>③</sup>。在创建过程中则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如在吴楚公所设立保卫医院总局时，“蒙卫生局梅君派黄袖巡捕四名在医院门首照料弹压，又派本局苦力二十余名前往打扫庐舍”<sup>④</sup>。并派华捕传谕绅董，“速将过街阁庙内闲杂人等一律驱逐，缘都署捕官催令开设医院，不能延迟”<sup>⑤</sup>。在保卫医院医资来源上，殖民政府同样予以协助，如“卫生局在河东德界南北分立两医院，……传谕河东绅董，飭在垓界内延请儒医四名，以便分派入局开诊”<sup>⑥</sup>。通过这些措施，殖民政府协调了社会各方关系，减轻了保卫医院筹建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加快了保卫医院创建的速度。

在殖民政府和社会的资金及政策支持下，保卫医院迅速建立。霍乱流行期间，该医院设分局11处，即河北张公祠、文昌宫、府署、捐局、五彩号胡同、双井、同吉顺、河东过街阁、三皇庙、源和栈、西沽，总局设吴楚公所东隔壁房屋，其分布尽可能覆盖城厢内外，以利患者就近诊治。同时，为保障疫情信息畅通，各局又增添现代通讯设备。据《大公报》报道：“津郡设立

① 《广告》，《大公报》1902年7月15日。

② 《广告》，《大公报》1902年7月6日。

③ 《中外近事》，《大公报》1902年6月22日。

④ 《中外近事》，《大公报》1902年6月20日。

⑤ 《中外近事》，《大公报》1902年6月23日。

⑥ 《中外近事》，《大公报》1902年7月4日。

医院十一处，虽属星罗棋布，尚嫌相隔云遥，分局日行事件均须陈报，总局遇有紧急事件恒恐耽延贻误，刻经总局谕令各局一律安设德律风（即电话），以期便捷。”<sup>①</sup> 保卫医院作为患者救治及疫情防控的基础设施而使津郡防疫进入有序状态，殖民政府有关防疫政策即可通过这一载体得到落实和强化。

保卫医院属于防止霍乱的应急性公共卫生机构，或为防疫而紧急设立的专门性医院，故有其自身特点：首先，具有多角色的社会防疫功能：（1）逐渐承担了基层社会的疫疾救助职能。《大公报》报道说：“各处报病报死者，例经各段捕官飭送都署呈验。近因瘟气易致人病，由副捕官胡君分谕各段：‘自即日起，遇有病人者，巡赴吴楚公所，以便医治。’”<sup>②</sup> 都署（即列强在天津设立的殖民机构都统衙门）在7月2日的批示中更明确指出：“各界患病之人应即前赴保卫医院诊视，所请仍归各绅董查核给药等情，勿再渎禀。”<sup>③</sup> （2）具有施以救治、隔离收容及济贫救济三者兼备的职能。如7月5日《大公报》报道说：“医院内收养之病人痊愈后更换新衣出门，前日西门外王爷祠医院内有病愈者八名皆着月白色簇新裤褂鱼贯而行，继有白衣华捕手执白旗书有病已大好，一齐开放等字样云。”<sup>④</sup> 在济贫救济方面，曾施以棺木628副，计除洋2172元、钱13400文外，又因焚毁病人衣裳赔款洋25.8元、钱61360文，并购置男女病人出院裤褂500套，计银412.5两<sup>⑤</sup>。（3）对染疫病人实行“施医施药”制度，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严禁发生勒索病人现象。总局告白明确指出：

① 《中外近事》，《大公报》1902年7月19日。

② 《中外近事》，《大公报》1902年6月22日。

③ 《都署批示》，《大公报》1902年7月2日。

④ 《中外近事》，《大公报》1902年7月5日。

⑤ 《广告》，《大公报》1902年9月6日。

“如查出上下办事人等，如同向病人及交易店铺勒索分文，本院必禀请督宪，重惩不贷。”<sup>①</sup>（4）除对染疫患者加强治疗外，亦负责本区内报病报死及病例登记，并代表政府颁发殓葬“执照”等具体事务，实际上已兼备部分卫生行政职能。其次，从内部管理来看，地方绅董既是善款募捐主体又是医院管理者，医院章程须由绅董与殖民政府卫生局协同制定，医院设施由绅董负责承办，政府有关防疫政策也通过绅董在医院执行。防疫医院既是疫源集中场所又是意外事件易发之地，为加强管理，巡捕广泛介入医院防疫事务。据《大公报》所载：“近因时疫，河东一带创设设施医院业经开办，并派巡捕公司一切事宜，各有记号，其看门之华捕肩束德国旗势之布匝一周，其撒垫石灰者肩束白布，其抬尸昇病人者肩束黄布，葬埋死尸者肩束绿匝，各司其事，不得僭越。”<sup>②</sup>巡捕介入防疫工作不仅强化了医院管理秩序，亦保证了相关防疫措施的执行与落实。从医院自身组成人员来看，除医生之外，更多的是“司事”、“夫役”配备。据统计，11 处分局共计医生 41 名，而司事、夫役两者则达 408 人，后者几乎是前者的 10 倍<sup>③</sup>。这种人员结构表明保卫医院防疫重于治疗的功能特点，适应了它所承担的集治疗、收容隔离、医院警卫、消毒防疫、报病报死及处理死尸等多职责要求。再次，从与政府关系来看，保卫医院与殖民政府联系密切且受其干预强烈。该医院筹建之时须禀请都署立案并经卫生局批准，创建中又获得政府资金援助与政策支持，防疫运行亦受政府强力干预。在医院章程制定上，由政府牵头会同各段绅董商定，并由卫生局颁发各医院执

① 《广告》，《大公报》1902 年 6 月 26 日。

② 《中外近事》，《大公报》1902 年 6 月 22 日。

③ 《保卫医院广告》，《大公报》1902 年 9 月 16～17 日。